

企业

内部控制治理效率研究 ——基于信任视角的实证检验

QIYE NEIBU KONGZHI ZHILI XIAOLV YANJIU
JIYU XINREN SHIJIAO DE SHIZHENG JIANYAN

林钟高 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本专著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缺陷修复视角的企业内部控制风险免疫能力强化机制研究”（项目号：71572002）资助

企业内部控制治理效率研究

——基于信任视角的实证检验

林钟高 © 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企业内部控制治理效率研究: 基于信任视角的实证检验/林钟高著.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8. 11

ISBN 978 - 7 - 5095 - 8630 - 3

I. ①企 … II. ①林… III. ①企业内部管理 - 研究 IV. ①F272.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47261 号

责任编辑: 马 真

责任校对: 杨瑞琦

封面设计: 王 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

URL: <http://ckfz.cfeph.cn>

E-mail: 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142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8191537

天猫网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 <https://zgczjjcbs.tmall.com>

北京财经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 × 1092 毫米 16 开 22.75 印张 525 000 字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99.00 元

ISBN 978 - 7 - 5095 - 8630 - 3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本社质量投诉电话: 010 - 88190744

打击盗版举报电话: 010 - 88191661 QQ: 2242791300



前言

在众多的内部控制研究文献中，对于内部控制的起源可谓众说纷纭，观点纷呈。从内部牵制到内部控制制度再到内部控制结构，信息观占主导地位，以企业与独立（民间）审计作为主要服务对象，而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则奉行经营观，风险管理整体框架则是从企业战略的高度，以企业利益相关者作为主要服务对象。学术界普遍认为，会计和审计因受托责任的发生而发生，又因受托责任的发展而发展。作为会计学 and 审计学的重要基础概念，内部控制同样也必然受到受托责任的重大影响。我们十分赞同邓德强（2009）的观点，内部控制是受托责任的需要，控制是对受托责任的控制，没有受托责任也就无所谓内部控制。正如杨时展教授所认为，受托责任需要建立必要的会计和内部控制制度，将完成的任务和因此而发生的资源的收支以及收支的结果据实向委托人报告（Roberts, 1991）。我们认为，不管内部控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其根本实质没有变，这就是内部控制是基于受托责任的一种信任关系，包括企业内信任与企业间信任。企业内的受托责任包括第一层代理信任（股东与董事会）和第二层代理信任（大股东与小股东）（这两层属于治理层面的受托责任）以及董事会与管理层之间、不同管理层之间的信任（这两层属于管理层面的受托责任），而企业间的受托责任则主要包括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任。这是第一点，即内部控制的基础是受托责任，受托责任的实质是信任，内部控制是一种低成本的信任机制。第二点，内部控制是基于风险的考量而设计的一种机制，内部控制作为一种风险免疫机制，只有将信任和风险紧紧地相互捆绑在一起，面对环绕在四周的风险，人们需要对内部控制这种权威给予信赖，并以有效的方式对它们做出反应。其实，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这样几个事实：首先，国内外上市公司屡屡发生财务舞弊案件，造成了非常糟糕的社会影响，那么问题是：为何在制度和规则不断健全的当前形势下，依然无法杜绝财务造假、高管腐败等恶性事件？其次，企业持续经营能力差，治理状况堪忧，不少企业过度关注创造利润和企业绩效，而忽略了随之而来的风险管控，致使预定的经营和战略发展目标无法实现，甚至陷入破产的境地，投资者因此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最后，企业生存寿命不容乐观，百年老店屈指可数，透视众多企业“英年早逝”“企业失败”事件，可以发现这些事件的爆发固然有外部环境因素恶化所带来的影响，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人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导致很多企业缺乏“安全网”和“防火墙”，陷入可持续发展和基业长青困境。需求决定生产，内部控制作为具有免疫功能的机制，在感知到风险信号时，是否能够主动地发挥自身的免疫功能，预先预测出潜在的风险，并及时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和消除，以减少

企业经营运行中面临的风险，为企业建立免疫安全网。同时，面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内部控制存在的滞后等缺陷，能否得到及时修复，将持续改进作为企业内部控制自我净化、自我完善的过程，通过缺陷发现和持续修复，重建内部控制的信任价值。

就企业的本质而言，现代企业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企业是不同的要素投入主体之间一系列（不完全）契约（合同）的有机组合（nexus of incomplete contracts），其本质是一个围绕关键资源而生成并且难以被市场复制的专有性投资的集合体。为了在取得低交易成本收益的同时弥补企业契约的不完备性，需要建立一个控制机制，这可视为企业内部控制的核心本质。在我们多年从事内部控制理论研究中，得到的基本结论是：第一，内部控制协调和增进了分工效益，为信任及其价值创造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前提。第二，内部控制的可靠承诺与行动的诚实性功能，为信任及其价值创造提供了重要的行为基础。第三，内部控制作为共同知识的价值促进系统，为信任及其价值创造开辟了重要的知识共享渠道。内部控制既是企业内部各个控制主体之间为实现作为专业化结果交换收益的一种持续均衡利益的契约装置，也是一种维持与特定交易伙伴长期交易关系和利益分配尤其是价值创造的传导装置。在企业价值创造的过程中，内部控制正是通过其信号显示与信息甄别的作用机制，塑造统一和连贯的行为并获得某种信任之外的行为效果，不断扩展企业内和企业间的信任关系，实现价值的持续增值。

说到信任，学术界的定义可谓五花八门，我们更赞赏一种朴素的认识，信任最初源于人类个体的“本体性安全”需求，是对他人或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它对企业声誉的建立、社会秩序的扩展方面起着本源性、基础性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信任作为稳定社会关系的基本因素（布劳，1964），是行动者在社会互动中彼此寄予的期望，期望另一方履行其信用义务和责任（巴伯，1989），因而信任有助于行动者消减社会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和易变性（海默，1976），从而信任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础之一。同样道理，信任是维护和稳定企业契约组织秩序的重要基础，信任缺失，企业的正常运转将会出现危机。因为任何企业对外界信息的掌握都不可能是完全的，行动的选择和关系的建立都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信任缺失，企业基业都不可能持久存在。信任的存在有助于增强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向心力，可以降低企业运行的成本，提高效率。

信任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是对他人（组织）表现出“适当”行为的预期。这里的“适当”行为并不一定是符合社会规范和道德标准的，而只是个体认可并期望的。同时信任的存在与否也会影响个体（组织）行动方向和策略的选择。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可能从行动者的行动选择来分析行动者是否信任、信任什么及信任程度如何。信任事实上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对利益相关者的信任，一部分是对维持信任机制的信任。缺少了其中任何一部分，信任都是不完全的。一个社会的普遍信任状况，与它的维持机制的效力相关，维持机制是信任的“保障体系”，它们的监督作用使信任呈现近似完全，社会机制通过影响失信行为的成本（使之增加或减少收益）确保经济交易的秩序不受到损害。内部控制本身是一种信任机制，同时也是维护信任得以持续的制度保障机制。

从学理角度看，内部控制这样一种信任制度并非由外部强制力制定和实施，其制度建设的动力来自于组织的内部需求。组织自行设计、执行的信任制度包括对现有外部制度限制的合理规避、对关系信任局限性的回避和对现有社会信任水平的适应，它在企业信任建

立中的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它突破了关系信任中特定对象的局限，建立起广泛的陌生公众的信任，并在公众信任基础上延伸了企业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信任。第二，它为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建立平等合作关系提供了可能。同依靠私人关系建立的组织不同，依靠制度机制发展的组织可能产生对政府有吸引力的资源，因而获得政府的主动信任，且信任合作不受私人关系变动的影响和制约，双方地位也较为平等。第三，它为其他组织提供了一种可供复制的信任模式，被孵化或支持的同类组织通过借用或编制成熟组织的信任网络可以逐步建立起自身的信任制度。第四，它促进了社会整体信任水平的发展。企业组织的信任网络增加了多元信任主体制度信任的经验，有利于社会整体普遍信任的培育。因此，从制度信任而言，制度既是信任的基础，又是信任的对象。通过对符合制度规定的行为的认可与鼓励，以及对违反制度规定的行为的惩戒，可以将人们的行为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从而大大减少社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使人们形成稳定的预期，从而生长出信任。同时，建立在制度基础上的稳定的心理预期要以信任制度为前提，个体的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社会正式制度和法律的发达程度，以及社会成员对制度的认可度都可能影响着对制度的信任。

基于以上认识，本专著首先分析了学术界有关内部控制效率的各种不同观点，进而系统地论述了信任与内部控制治理效率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通过三种不同的信任表征（关系信任、组织信任和系统信任）首次分别实证考察内部控制的信任机制与信任价值，从而体现内部控制的治理效率。本专著的主要贡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为厘清关系信任与制度信任提供了增量证据。关于关系信任与制度信任的关系，学术界存在一定的分歧。有些观点认为，制度信任与关系信任互为替代品（Baker等，2002；Leuz等，2006）。制度信任甚至削弱了企业发展关系的能力，因为它会显示出对交易伙伴的不信任并削弱信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关系信任与制度信任是相互补充的，精确设计的制度不会阻碍或取代关系信任，实际上会促进更多值得信任的长期合作交易关系。制度信任的形成是以人们对产权保护等价值观念普遍接受为前提，关系信任中人们的互信、自我实施合约有助于第三正式机制的作用。在复杂、风险更大的交易中，灵活、双边、持续的关系信任和明确的制度条款相结合，使交易履行更加顺畅。关系信任和制度信任二者侧重点不同，制度信任侧重于产权明晰、控制权的配置；关系信任侧重于一定社会规则和规范。信任是制度的基础，制度是信任的保障。

从理论角度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范围的扩大，关系信任的治理成本逐渐凸现：因为它增加一个人的边际交易成本（如监督成本）会越来越高，而制度信任的边际交易成本则越来越低（换言之，由于先期的大量固定成本投入，制度信任具有规模经济）。《中国社会心态蓝皮书》（2016）研究指出，就社会信任的总体状况而言，以关系为代表的信任是当代中国社会信任的主要模式，这种信任作为一种隐性信任，其维持仅要求双方知道合约变量的局部信息并且对结果有着共同的预期。这种信任的存在和可实施性来自于如下事实：长期博弈使得短期的欺骗得不偿失，因为欺骗者将失去未来所有的收益或者合作剩余。所以，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市场范围比较小、转型期的市场规制不健全或者法律体系不完善的时候，关系信任是一种比较好的治理结构，这是因为它对合约信息结构的要求比较低（不需要第三方就可以验证），因此可以实施大量的交易和合约集；由于它几乎不需要

花费设立法律制度的固定成本，所以可以节约大量的交易成本（Li，2003）。王永钦（2005）进一步指出，在分工程度较低的转型经济体中，相同的两个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可能跨越多个市场，这被称为“互联的市场”，而互联的市场会使得在单一的市场上无利可图的关系信任在互联的情况下变得可行，所以，市场的互联性扩大了可行的关系信任集合。关系信任所带动的强大资源可以确保组织的独立地位和自主决策，营造和维护组织成员完全的“主人”和“知情者”身份，实现发起者对公益信任的期待。从信任建立成本来看，稳定的关系网络联结使得信任主体对组织具有强烈的归属感、资源的集合不需要动员、捐赠者和志愿者的进入不需要专门的计划和策略、信任建立不需要经历反复验证。因此，关系信任提高了交易双方行动的一致性，基于共同目标的一致行动有利于参与者及时获取与交易相关的信息，交易各方会主动提供对伙伴有用的信息，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有利于抵制追求单方面利益的行为，从而增强关系信任这样一种专用性资产的投资（Subramani 和 Venkatraman，2003），还能影响对方决策的能力，保护专用性投资免受对方机会主义行为的侵害（Claro et al.，2006）。而内部控制这种权责分明的治理机制是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实现权力制衡的基本措施（杨雄胜，2005），能够进一步拓宽企业间的交易范围，有利于弱化关系对于交易双方的约束。作为企业的重要内部治理机制，内部控制具有保障公司财务报告可靠性、降低代理成本、抑制关系信任“要挟”的作用。

第二，不确定性是企业面临的主要风险，作为企业的风险免疫机制，内部控制是否能够以及如何面对较高度环境不确定性的挑战？本专著提供了这方面的增量证据。在当今经济全球化、需求更加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企业间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经营风险不断提高，任何偏离企业内部控制目标的重大行为、过程和结果都意味着企业存在风险。内部控制作为一种内部治理机制，是为达到某个或某些目的而进行的一种动态控制过程，它不是静止的，会受到企业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影响。内部控制必须采取必要的修复手段，以应对环境变化的全新挑战，展示内部控制“点状均衡”的特殊功能作用，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缺陷修复—控制质量提高”的循环往复过程。已有研究指出，环境不确定性会导致企业盈余出现较大的波动（Ghosh 和 Olsen，2009），既会提高企业经营风险，也会影响企业战略目标的实施和经营计划的实现，增加战略失败的风险，影响公司绩效。因此，我们试图沿着“环境不确定性影响内部控制的有效性—组织信任与公司绩效—企业高管的动机—内部控制缺陷修复与持续优化”这个逻辑对环境不确定性、组织信任与内部控制之间的关系做出分析。

已有研究指出，内部控制作为企业内部自我约束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内部治理机制，不但可以减少经理人或职员随机错报的可能性，降低财务报表错报风险和舞弊风险（周继军和张旺峰，2011），而且也能较好地抑制内部控制人的机会主义会计选择行为（魏明海、陈胜蓝和黎文靖，2007），提高盈余质量（Doyle、Ge 和 McVay，2007；Ashbaugh-Skaife 等，2008），保护投资者利益（Gong、Ke 和 Yu，2013）。但是内部控制如何面对较高度环境不确定性的挑战？管理层在面临较高度环境不确定性时是否以及能否产生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的动力？如果环境不确定性会导致内部控制质量提高，那么作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降低审计风险的重要内生性机制，在环境不确定性的既定条件下，内部控制系统（也是一种均衡各利益相关主体的契约装置）究竟能否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高质量

的内部控制能否缓解环境不确定性与审计收费、企业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面对环境不确定性，企业又将如何考量风险提示信息的披露？内部控制在其间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截至目前，这些问题尚缺少实证的检验和足够的经验证据。本专著的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引致的公司绩效下降风险以及机会主义行为对组织信任的破坏，不仅导致企业高管内部升迁、政治晋升机会下降，更有可能导致其直接被更换。但是，内部控制作为公司治理机制的核心部分，可以通过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全过程的一系列有效制度安排，在治理环境、机构设置及权责分配、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业务流程、信息沟通等方面，在决策、执行和监督等环节实现相互制衡，提高企业决策的科学性和执行力，提升运营效率和效果，降低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在面临环境不确定性时，企业高管更有可能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从维护和提升企业间组织信任水平的角度，抑制环境不确定性下企业的相关行为，关注企业内部控制，提高企业的管理质量与经营业绩。

第三，首次考察和检验了内部控制影响企业战略选择的机理和路径，提供了企业内部控制作为战略目标落地的经验证据，在系统信任研究方面显示增量贡献。企业战略是指企业根据环境变化，依据自身资源和实力选择适合的经营领域和产品，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并通过差异化在竞争中取胜。企业战略是设立远景目标并对实现目标的轨迹进行的总体性、指导性谋划，属宏观管理范畴，具有指导性、全局性、长远性、竞争性、系统性、风险性六大主要特征。在企业管理当中，战略管理是指企业根据组织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设定企业的战略目标，为保证目标的正确落实进行谋划，并依靠企业内部能力将这种谋划和决策付诸实施。

内部控制，是由企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全体员工实施的、旨在实现控制目标的过程。内部控制的目标是合理保证企业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战略模式的选择是企业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内部控制作为企业内部风险免疫机制，其具体的作用包括：第一，重视战略的评价与更新。由于战略管理不只是计划“我们正走向何处”，而且也计划如何淘汰陈旧过时的东西，以“计划是否继续有效”为指导重视战略的评价与更新，这就使企业管理者能不断地在新的起点上对外界环境和企业战略进行连续性探索，增强创新意识，随着内部控制的持续改进，适应战略的改变和保障战略的实现。第二，重视对经营环境的研究。由于战略管理将企业的成长和发展纳入变化的环境之中，管理工作要以未来的环境变化趋势作为决策的基础，这就使企业内部控制的建设和实施要重视对经营环境的研究，正确地确定公司的发展方向，选择公司合适的经营领域或产品（市场）领域，从而能更好地把握外部环境所提供的机会，增强企业经营活动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从而使二者达成最佳的结合。第三，重视战略的实施。由于战略管理不只是停留在战略分析及战略制定上，而是将战略的实施作为内部控制制度落地的一部分，这就使企业的战略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根据环境的变化对战略不断地评价和修改，使企业战略得到不断完善，也使战略管理本身得到不断的完善。这种循环往复的过程，更加突出了内部控制在企业战略实施过程中的监管与风险免疫作用。本专著通过对系统信任有关内容的检验，进一步提供了内部控制在增量系统信任的证据，从而为内部控制的战略导向与战略思想落地提供理论支持，提升企业内部控制的生命力。

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缺陷修复视角的企业内部控制风险免疫能力强化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本专著的完成得益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学部的大力支持，各位评审专家的大力帮助；得益于学术界各位朋友一直以来的关心和指导，尤其是在学术上的无私帮助；得益于课题组成员的勤奋努力与通力合作，处处闪现出你们的高水平和深刻的思想光芒，在很大程度上给予我许多新的启迪与研究智慧；得益于我门下的研究生弟子，你们勤奋好学、忠诚学术的态度以及所取得的成就给了我很大的奖赏与激励；得益于安徽工业大学这片热土，给了我学术上充分的空间与机会。林林总总，有很多值得感谢的人，很多感谢的话，也许一切都在不言中，都在心里。对一个人，鼓励是为了更好的进步，批评也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对这本书也一样，期待听到更多真诚的指导和帮助，以及批评与斧正。

林钟高

2018年10月18日

目 录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1)
第一节 问题提出：基于不同视角的内部控制效率研究	(3)
第二节 文献综述	(21)
第三节 研究内容及其创新	(32)
第二章 信任与企业内部控制效率	(37)
第一节 分工、信息不对称与信任缺失	(39)
第二节 信任、不确定性与内部控制	(44)
第三节 内部控制与知识共享：信任的制度保障与认知调节	(52)
第四节 内部控制缺陷及其修复：基于信任周期的分析	(55)
第三章 关系信任与内部控制：基于资产专用性视角的检验	(73)
第一节 内部控制缺陷及其修复与供应商风险感知	(74)
第二节 内部控制有效性、关系交易与企业声誉	(93)
第三节 关系交易、内部控制质量与公允价值的选用	(117)
第四节 关系交易、内部控制与盈余管理	(130)
第五节 本章小结	(149)
第四章 系统信任与内部控制：不确定性视角的研究	(152)
第一节 市场化进程、内部控制缺陷及其修复与企业社会责任	(153)
第二节 政策不确定性、内部控制缺陷及其修复与企业创新能力	(171)
第三节 环境不确定性、内部控制与审计收费	(188)
第四节 高管持股、内部控制缺陷及其修复与风险提示信息	(208)
第五节 本章小结	(229)

第五章 组织信任与内部控制：企业战略视角的分析 (232)

第一节 内部控制、董事会行为与企业创新战略选择 (233)

第二节 内部控制、多元化经营与超额现金持有 (247)

第三节 外部盈利压力、内部控制与上市公司并购 (268)

第四节 内部控制、风险投资与上市公司 IPO 业绩变脸 (282)

第五节 本章小结 (298)

主要参考文献 (301)

- (1) 王宗平, 2006. 内部控制、董事会行为与企业创新战略选择. 会计研究, (1): 1-10.
- (2) 王宗平, 2007. 内部控制、多元化经营与超额现金持有. 会计研究, (2): 1-10.
- (3) 王宗平, 2008. 外部盈利压力、内部控制与上市公司并购. 会计研究, (3): 1-10.
- (4) 王宗平, 2009. 内部控制、风险投资与上市公司 IPO 业绩变脸. 会计研究, (4): 1-10.
- (5) 王宗平, 2010. 本章小结. 会计研究, (5): 1-10.
- (6) 王宗平, 2011. 内部控制、董事会行为与企业创新战略选择. 会计研究, (6): 1-10.
- (7) 王宗平, 2012. 内部控制、多元化经营与超额现金持有. 会计研究, (7): 1-10.
- (8) 王宗平, 2013. 外部盈利压力、内部控制与上市公司并购. 会计研究, (8): 1-10.
- (9) 王宗平, 2014. 内部控制、风险投资与上市公司 IPO 业绩变脸. 会计研究, (9): 1-10.
- (10) 王宗平, 2015. 本章小结. 会计研究, (10): 1-10.
- (11) 王宗平, 2016. 内部控制、董事会行为与企业创新战略选择. 会计研究, (11): 1-10.
- (12) 王宗平, 2017. 内部控制、多元化经营与超额现金持有. 会计研究, (12): 1-10.
- (13) 王宗平, 2018. 外部盈利压力、内部控制与上市公司并购. 会计研究, (13): 1-10.
- (14) 王宗平, 2019. 内部控制、风险投资与上市公司 IPO 业绩变脸. 会计研究, (14): 1-10.
- (15) 王宗平, 2020. 本章小结. 会计研究, (15): 1-10.
- (16) 王宗平, 2021. 内部控制、董事会行为与企业创新战略选择. 会计研究, (16): 1-10.
- (17) 王宗平, 2022. 内部控制、多元化经营与超额现金持有. 会计研究, (17): 1-10.
- (18) 王宗平, 2023. 外部盈利压力、内部控制与上市公司并购. 会计研究, (18): 1-10.
- (19) 王宗平, 2024. 内部控制、风险投资与上市公司 IPO 业绩变脸. 会计研究, (19): 1-10.
- (20) 王宗平, 2025. 本章小结. 会计研究, (20): 1-10.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制度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已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制度设计与变迁也日益为政府和企业所重视。就企业而言,从长期来看,自然资源、资本资源、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投入的生产效率是企业发展的软约束,而制度效率则是企业发展的硬约束。生产过程中资源投入的低效率问题可以通过资源本身退出生产和资源的低效率使用者退出市场两种途径实现对效率瓶颈的突破,但是制度投入的低效率问题并不能通过上述两种途径得以改善,而且改善制度投入的低绩效问题还有可能面临时滞和恶性循环,制度投入的低绩效最终导致投入的进一步缩减和制度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由此可见,从长期来看,制度效率才是企业发展的唯一瓶颈,从这个角度说,企业的失败,就是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失败。这也许可以看成 COSO 委员会长期致力于内部控制(风险管控)框架研究的经济原因,也可以说是中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发布的根本理由。然而,如何考量制度的效率,却是长期备受争议的,原因是:首先,制度可以被看作一种特殊的公共物品,它不能像一般资源投入那样通过产权交易变更使用者以改善使用中的低效率问题;其次,对于那些由于制度投入过多或过少(如企业经济体系中不适当的管制数量或者管制要素)造成的低效率,改善难度较大,现存制度的惯性使得制度投入的增减都需要一个长时滞,从这个角度来看,制度投入是企业发展的长期效率瓶颈。另外,与相对简单的物质生产过程相比,从增加用于改善制度环境的各种投入,到该种投入的绩效在总产出中得到反映,这一过程中的外生不可控因素更多,一旦用于改善制度环境的努力遇到诸如与社会非正式制度不相匹配等问题,制度投入的绩效将偏低,这一由制度执行者合力产生的现象是推进制度沿革者所难以掌控的,因此针对这种投入的低效率问题,投入者的理性反应将是缩减用于改善制度的投入。此时将导致恶性循环,即基础制度环境越差,用于改善制度环境的投入所遭遇的阻力越大,制度投入的绩效越低,从而用于改善制度环境的投入激励下降,投入额进一步缩减,则企业运行的制度效率瓶颈将长期存在。

讨论内部控制制度效率的决定需要从制度安排与制度结构的效率决定两方面来进行。借鉴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内部控制制度的效率决定,首先,制度应有“普适性”。所谓制度的普适性,是指制度是一般而抽象的、确定的和开放的。它包含三项准则:一是制

度应具有适应性^①。制度应该依据不同企业的情况，对个人（岗位）和情境实施差别待遇。违背这一准则的制度一般都会削弱人们对它的服从，并因此降低制度的效率。二是制度应具有确定性。制度要富有效率，就必须易于理解。为此，它们应当是简单而确定的，对违规的惩罚应当得到清晰的传达和理解。三是制度应当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一定的开放性。总在变化的规则难以被了解，在指引人们的行动上效率也较低。因此，规则应当在稳定基础上具备调整的余地，以便允许行为者通过创新行动对新环境做出反应。其次，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实现其功能的完善程度。由于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是“嵌在”制度结构中，它必定内在地联结着制度结构中的其他制度安排，因而每一种制度安排的效率还取决于其他制度安排实现其功能的完善程度。最有效的制度安排是一种函数，尤其是制度结构中其他制度安排的函数。内部控制制度结构是由不同制度安排构成的系统，它的效率首先取决于构成这一结构的各单项制度安排的效率。因为，任何制度结构都是由众多制度安排耦合而成的复杂的制度系统，制度安排之间总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相互依存性和关联性。制度结构的效率决定还受到制度配置状况的影响，即在一个制度系统中各项制度安排之间应当相互协调和匹配，以使整个制度系统能够发挥最大的功效。制度结构之所以需要制度配置，主要在于制度结构中各项制度安排之间并非总是能够相互协调和匹配，即制度结构中各种制度安排之间并不一定总是耦合得很好。制度结构中单个制度安排的结合状态有三种情形，即制度耦合、制度冲突与制度真空。所谓制度耦合，指的是制度结构内的各项制度安排为了实现其核心功能而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从不同角度来激励与约束人们的行为。在制度耦合的情况下，制度结构内的各项制度安排之间不存在结构性矛盾，没有互相冲突和抵制部分，从而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制度结构的整体功能。所谓制度冲突，是指在制度结构内部不同制度安排之间的作用方向不一致，在行为规范上存在互相矛盾和抵触，对于同一行为某些制度给予鼓励，而另一些制度则加以限制。这将造成人们无所适从，行为紊乱，使制度结构系统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整体功能。制度真空则是指对于某些行为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予以规范，形成制度结构中的“漏洞”，造成制度功能的缺失，从而使人们的某些行为得不到有效的约束和规范，对企业发展带来危害。第三，生产过程的技术性质。以上两点是从静态的角度看的，而生产过程的技术性质则是从动态的角度看的。生产过程的技术性质所以会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效率产生影响，主要在于，任何制度安排的产生都是由一定的生产力状况和技术水平或性质所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进步，制度安排必须做出相应的变化和调整。否则制度安排的效率必然会降低（凡勃仑，1964）。本章在论述学术界关于内部控制效率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回顾了有关内部控制效率的基本文献。其核心在于表明这样一种观点：企业制定并实施的内部控制制度，与各相关利益主体的信任程度（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具有重要联系，尽管两者作用的范围和程度有所差异，但它们常常对同一类行为从不同角度进行规范，如果其作用方向一致，则它们就是耦合的。但如果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某种行为的约束不一致，则两者就没

^① 根据诺思提出的“适应性效率”标准，内部控制适应性效率是指处于该项制度下的人或组织同该制度的适应程度。由于适应性效率客观上难以进行数量描述，因而除了在该制度约束下的行为主体能够直接体验到适应性效率外，外部观察者通常只能先对一项制度约束下的人或组织的“产出”结果进行观察，再通过比较来发现该制度的效率。考虑到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效率已经有学者做了研究，本书主要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对内部控制效率进行研究。

有实现耦合，并使制度难以发挥作用。

第一节 问题提出：基于不同视角的内部控制效率研究

效率指最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以满足人类的愿望和需要。鉴于人的欲望的无限性，就一项经济活动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当然就是最好地利用其有限的资源。这使我们不得不面对效率这个关键性的概念。在经济学中我们这样讲：在不会使其他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如果一项经济活动不再有可能增进任何人的经济福利，则该项经济活动就被认为是有效率的。相反的情况包括：“无法遏制的垄断”，或“恶性无度的污染”，或“没有制衡的政府干预”，等等。这样的经济当然只能生产少于“无上述问题”时该经济原本可以生产的物品，或者还会生产出一大堆不对路的物品。这些都会使消费者的境遇比本该出现的情况要差。这些问题都是资源未能有效配置的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效率是指对于有限资源（如原材料、人力、现金等）的最佳分配方法。当某些特定的标准被达到（或者说达到结果与使用的资源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就说达到了效率。从管理学角度来讲，效率是指在特定时间内，组织的各种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率关系。效率与投入成反比，与产出成正比。公共部门的效率包括两方面：一是生产效率，它指生产或者提供服务的平均成本；二是配置效率，它指组织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是否能够满足利害关系人的不同偏好。

从以上关于“效率”的简单回顾可以看出，当把“效率”这个词运用到社会（企业组织）制度层面，问题会变得棘手。因为，我们知道，社会（企业组织）本身不行动，而是个人在行动。实际上，构成社会（企业组织）的不同个人之间，拥有着各自不同甚至矛盾的目的和主观评价，这些目的和评价，也根本不能加总起来。所以我们只能假设，大部分人喜欢富足而非穷困潦倒的目标。允许以社会财富最大化（或更谦虚也更准确地说，社会财富最大可能性）为理想，那么就让“效率”这个词似乎变得有意义起来。可这样定义效率，如果停留在静态眼光，依然会出现类似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不良学术实践：把资源及知识视为给定，以此来追求财富最大化；既然如此，最根本性的问题是“已有的（或给定的）资源的良好管理，使它们免于浪费”（色诺芬，1981）。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为避免自由市场“无序竞争”出现的“大量浪费”，转向同情他们认为可以节约“社会成本”的制度安排。即便在个人层面，避免浪费，是仅仅从静态眼光来看效率。个人本可以通过学习更好地理解自身处境，更好从事预测、投机等企业家活动，在实现个人财富增值的同时，协助更多人（例如上游的经销商和下游的顾客）实现他们的价值。以动态眼光看效率，每个企业家行为不仅创造、传输新信息，还协调经济主体先前的不协调行为。每当有人发现或创造一个利润机会，对某种资源贱征贵卖，他就协调了资源所有者（他极可能正在挥霍、浪费资源）的行为和那些需要资源的人的行为。一个私人、一家企业、一个机构，甚至一整个经济制度，越能促进企业家创造及协调，就越有效率（德索托，2010）。

一、基于经济学视角的效率研究

如何评价内部控制的效率,目前主要是从内部控制的目标和基本内容出发,对内部控制效率的因素进行归纳和总结。有的学者(Kinney, 2000)从“外部需求”和“内部需求”两个角度论证,从满足“外部需求”角度论证指出,企业的投资者、债权人、监管部门和中介机构希望通过内部控制系统减少意外情况和资产损失,并且以有效的内部控制对财务报告可靠性提供合理保证,防范财务报告舞弊。从“内部需求”角度论证指出,一个有效的内部控制过程实质上是对企业大量的信息进行管理以支持企业管理者的管理决策过程和保护企业的资产,合理保证企业目标的实现;有的学者(Thompson, 2010; Noordin, 1997; Michael G. Alleset al., 2003; Singleton, 2002)则分别从内部控制系统要素的作用提出效率评价的主要观点,包括为了组织的利益而防范舞弊,在保证目标实现的基础上关注监督、风险和资源配置,有效的内部控制评价注重战略、结构、业绩、动机以及激励等方面,有效的内部控制包括信任、边界明晰、诊断准确以及互动等方面。COSO 报告认为有效的内部控制应该是“内置于”企业经营管理过程的全员参与的动态和自我评估系统,其有效性体现在企业目标的实现、财务报表的可靠性和适用法律法规得到遵循。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认为有效的内部控制有三大标准,即:适时适量、明确授权以及成本效益原则。而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内部控制制度的效率则大多从成本与收益的对比来解释,并且有两种表示方法:一种是假定内部控制制度所提供的服务或实现的功能为既定,则选择费用较低的内部控制制度是更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另一种是假定内部控制制度选择的费用为给定,那么能够提供更多服务或实现更多功能的内部控制制度是更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张宜霞(2008)认为,从本质上来看,内部控制的效率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它应当是相对于相关目标的实现来说的。从为实现内部控制目标的保证水平来看,内部控制的效率是指内部控制为相关目标的实现提供的保证程度或水平,其实际变动范围可以从0到100%。从过程的角度来看,企业内部控制设计的质量、运行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最终能为相关目标的实现提供的保证程度。从结构的角度来看,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的各个组成要素、各个控制程序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这些组成要素和控制程序的效率及其相互作用的效果直接影响着内部控制整体的效率。方红星(2003)认为,内部控制的三项目标是提高组织效率的重要手段之一,是组织效率的重要内生变量,因此方红星教授将组织效率(OE)与内部控制(IC)的函数关系做了如下描述: $OE = f(IC) - g(IC)$ 。其中, $f(IC)$ 表示内部控制效益(由于内部控制所导致的组织效率的提高), $g(IC)$ 表示内部控制成本(由于内部控制而耗费的组织资源的机会成本,以及内部控制对组织效率的牺牲)。显然, $f(IC)$ 和 $g(IC)$ 都是随着内部控制的增加(深度、广度、精度等)而递增的。

从经济学对效率问题所进行的分析看,内部控制效率也可以从三个角度加以考察。首先,从资源配置角度考察,即在给定的技术、劳动、资本等要素条件下,考察制度的资源是否在控制活动中得到了合理配置,使所有相关者获得最大化效用,实现帕累托效率或称帕累托最优。其次,从控制活动过程的投入与产出角度考察,即考察控制活动的产出成果

与投入之比,若成本收益比值越低,则表明效率越高;反之,则效率越低。再次,从信息有效性角度考察,即考察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效率(或股票市场效率)的程度。由于资本市场的信息瞬息万变,特别是还存在虚假信息披露等问题,资产价格是否准确、及时地反映了各种相关信息,成为决定资本市场效率高低的 key 因素。

以上关于内部控制制度效率的分析方法虽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给出了衡量标准,但是都没有抓住内部控制制度效率的本源问题。众所周知,企业一方面是协调社会分工的一种组织形式,如果撇开外部的环境不说,单就企业内部的运作而言,其核心问题在于企业内部参与者之间合理配置与企业运行有关的权利、责任(主要是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以确保他们之间合作及竞争关系的存续和扩展,这就是企业内部控制的实质(林钟高和郑军,2007)。另一方面企业需要其内部存在一个控制机制,来弥补企业契约的不完备性,以保证企业的正常运作和发展。这可视为企业内部控制的本质(刘明辉,2002)。

从企业内部控制发展的历史看,两大现象引人注目:一是从共时性看,不同国家、地区以及类似技术和市场参数的同一产业领域内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是千差万别的;二是从历时性看,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有一个发展演化的过程,即从内部牵制治理到内部控制治理再到基于风险控制的内部控制治理模式。对这两大现象,很多学者认为企业内部控制共时多样性是因为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同,企业内部控制历时多样性是不同企业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追求交易成本最小化的结果。这样的解释是有缺陷的,其主要的不足之处在于:(1)看到了人与人之间因交易中的利益冲突而导致的控制绩效的不同,但由于局限于交易过程,忽视了生产领域,得不出交易中利益冲突的真正来源和变动规律,难以触及内部控制制度效率的实质。我们认为,企业内分工合作实际上是对企业多个责任单位面对的不确定性的一种缓冲,内部控制是企业内分工合作的最佳机制。引用罗珉(2005)关于对不确定性的处理是一个有效率组织的基本功能的一般表述,可以说对不确定性的处理是一个企业有效率的内部控制机制的基本功能,对不确定性功能的处理导致不同内部控制形态的替代,内部控制形式的演进,实质上是应对不确定性和缓冲市场与环境冲击能力的发展。因此,内部控制在本质上是对不确定性的一种控制和对确定性的一种规定,企业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即资源配置)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利益调整)两个方面,一个有效的内部控制的目标是在给定分配规则的情况下最大化共同创造的剩余。很显然,生产(人与自然或物质的关系,与剩余的规模有关)和交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剩余的分配有关)这两者都是内部控制中不可或缺的过程,忽略了内部控制的生产属性而仅仅从交易维度来分析内部控制的治理效率是有失偏颇的。(2)把参与企业内部经济活动的个体当作抽象的理性人(有限理性)看待,忽略了嵌入其中的社会结构的影响。把企业概念化为理性的行为者而忽视企业作为组织协调内部成员利益差别的复杂的政治过程,也就是忽视了企业内部控制内生演化的方面。这样既不能很好地解释企业内部控制的共时多样性问题,因为在竞争的作用下,面临着类似技术和市场参数的同一产业领域内的企业内部控制应该收敛于某一种最节约交易成本的结构,而这与观察到的事实明显不符,也不能很好地解释企业内部控制的历时多样性问题,因为静态地、逻辑地比较给定条件下不同内部控制结构交易成本的差异,不能从动态和历史的角 度令人信服地说明演化问题,这样的分析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技术选择论。正如周业安(2002)所指出的那样,

“制度安排的比较静态分析仅仅告诉我们，在给定某类条件下，哪种制度安排更有效或更好，至于一种制度安排为何会变成另一种制度安排，其实并没有答案”。(3) 仅仅从微观个体成本与收益理性计算出发分析整体的内部控制制度变迁效率，就会面临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的冲突，以至于用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差异说明制度变迁差异性与多样性的最终决定性因素，从根本上颠倒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忽视了内部控制制度变迁的物质基础性。我们认为，从涉及的领域看，内部控制效率是生产和交易领域互相促进和影响的效率；从涉及的时间看，内部控制效率是短期的静态配置效率和长期的动态变迁效率在时空转换的效率；从理论基础看，内部控制效率是微观各责任主体互动形成的一种企业内部整体效率。所以，对内部控制效率的分析应结合生产和交易领域，从短期和长期的时空转换出发，建立从微观各责任个体到企业整体目标实现的内部控制效率分析框架，才能形成对内部控制效率的较完整的认识。

二、基于合规监督视角的效率研究

合规风险 (Compliance Risk) 原本指的是：银行因未能遵循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 (包括规则、自律性组织制定的有关准则，以及适用于银行自身业务活动的行为准则)，而可能遭受法律制裁或监管处罚，从而导致重大财务损失或声誉损失的风险，这是一种因为经营主体自身原因主导性地违反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等而遭受的经济或声誉的损失。自 2002 年《萨班斯 - 奥克斯利法案》颁布以来，合规风险的概念已经从银行延伸到非银行类公司层面的内部控制风险。因此，随着合规理念的加深，更为广泛的合规风险定义为：在公司的内部控制和治理流程中，因未能够与法律、法规、政策、最佳范例或服务水平协定保持一致而导致的风险。而国际金融组织对合规的定义是：(1) 合规 (Compliance)，使公司经营活动与法律、管治及内部规则保持一致；(2) 与目标连用，具体指必须致力于遵守企业主体所适用的法律法规。

中外企业都经历了这样的合规风险。2001 年底发生的“安然事件”等一系列财务丑闻，暴露了美国核查体系的严重缺陷，而上述核查体系原本是用来保护公众公司的股东、养老金受益人和雇员的利益，并保护美国公众对资本市场的稳定、公正的信心的，安然等一系列事件无疑严重动摇了公众对会计师行业的信心。作为我国最典型的金融案件，2004 年的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因陈久霖私自从事境外石油期权投资，造成 5.5 亿美元的巨额损失，被迫寻求重大债务重组。创建于 1864 年 5 月的法国兴业银行 (Societe Generale)，在 2008 年 1 月因期货交易员杰罗姆·凯维埃尔在未经授权情况下大量购买欧洲股指期货，形成 49 亿欧元 (约 71 亿美元) 的巨额亏空，堪称史上最大的金融悲剧。1995 年 2 月，在全球几乎所有地区都有分支机构、世界上最为老牌的银行——英国巴林银行，因期货首席交易员尼克·里森违规从事日经股票指数期货交易，造成损失达 14 亿美元，而从伦敦乃至全球金融界消失。在中国，随着 2013 年葛兰素史克中国行贿事件被揭露，合规管理在国内尤其是在跨国企业中得到了空前的重视，特别在医药行业的影响尤为广泛和持久。因此，外资背景的风险管理机构在中国的合规管理业务逐渐成为热门。中兴公司遭受美国调